

# 内外资互促、双循环联动的就业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朱金生 屈豆豆 王振国

【摘 要】文章利用 OECD 公布的 2000~2019 年全球区域间企业投入产出数据库和配套的就业数据库,基于内外资互促、双循环联动的就业效应分解框架,从国家、行业和企业 3 个层次分析双循环的发展态势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内循环水平及其就业效应远高于外循环;不同类型的外循环之间,复杂外循环水平及其带动的就业均超过简单外循环。分行业来看,服务业参与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最多,且呈上升趋势,是促就业的牵引器;农业参与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呈一定的下降趋势,但其总量仅次于服务业,是稳就业的缓冲器;制造业参与双循环的就业带动效应位列第三,且随时间变化不大,是保就业的稳定器。分企业类型来看,内资企业间的循环创造的增加值和带动的就业最多,且呈上升趋势;内外资企业间的循环和外资企业间的循环带动的就业规模次之,且随时间有所下降。总体上,双循环表现出“内外资互促、内循环拉动、外循环赋能”的就业效应。结构分解分析结果表明,中间供给和最终需求的就业带动效应为正,抵消了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值率对就业的负向影响,保证了就业平稳增长;各因素的贡献存在行业与时期异质性。文章认为,坚持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通过企业间分工合作推动供需良性互动,是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机制保障。

【关键词】双循环 内外资企业 就业 投入产出分析 结构分解分析

【作 者】朱金生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屈豆豆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振国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后。

## 一、引 言

就业乃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和局部冲突加剧扰乱了国际分工秩序,破坏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在价值链上下游,不少企业生产出现不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双循环推动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实现机制及政策路径研究”(编号:22BJY048)的阶段性成果。

同程度的波动,原本畅通的产供销循环遭到破坏,导致经营活动出现摩擦性放缓,就业压力显著增加(曾艺等,2023)。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共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做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战略部署。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有效应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需求一直是经济及就业增长的重要源泉(江小涓,2010)。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消费市场规模巨大,国内需求对就业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出口贸易已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因此,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促进劳动力充分就业的现实要求(葛阳琴、谢建国,2019),系统考察内循环和外循环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现有关于双循环就业效应的研究主要从国家或行业层面进行考察,很少有研究关注企业层面的双循环发展状况及其就业效应。少数研究考察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参与内、外循环对就业的影响(张俊荣等,2022),但忽视了不同企业在内外循环中的位置与作用差异,因而研究发现不足以全面理解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双循环和带动就业的具体表现。稳就业的关键在于稳企业,不同类型的企业在稳就业中的作用需要结合双循环的体系和新发展格局进行理解。内资企业作为内循环的主体,与位于外引内联重要节点的外资企业共同参与双循环,对高质量充分就业大局起着关键作用。现有文献大多并未系统考察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对就业的间接影响(包群等,2015;韩国高等,2021),在国内外价值链重构过程中,企业之间中间产品的供给循环呈现明显的“黏性”特征,并对就业产生深刻影响(Antràs,2020;Yue等,2024)。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内、外资企业间的分工合作会对双循环及就业产生什么影响?其影响机制如何?关于这些问题,现有研究尚未提供系统的解答。

鉴于此,本文构建包含内外资互促、双循环联动的就业效应分解框架,考察现阶段中国内、外资企业间分工合作参与双循环的水平及其就业效应。具体研究问题包括:(1)中国不同行业的内外资企业参与双循环的现状如何?(2)不同行业的内外资企业间循环对就业的影响如何?(3)双循环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有什么样的影响?通过回答以上问题,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化对双循环就业效应微观机制的认识,为中国优化引资政策、实现“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同频共振提供经验参考。

## 二、文献综述

现有与本文研究议题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关于双循环的内涵界定,双循环水平的测度,以及对双循环就业效应的考察。

关于双循环的内涵,目前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界定方式,一种从需求角度出发,将内、外循环分别界定为内、外需(徐奇渊,2020);另一种从供给视角出发,将内、外循环分别视为向国内、国外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汤铎铎等,2020)。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循环主要包括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4个环节(谢伏瞻等,2020)。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从需求侧出发,重视消费、分配和流通的重要作用;又要兼顾供给侧特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高质量供给体系(江剑平等,2024)。因而,全面理解双循环的经济意义及其就业效应,需要结合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开展研究。

关于双循环的测度方法,有学者使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来衡量外循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江小涓、孟丽君,2021),但该指标对同一加工货物在进口材料与出口产品中重复统计,统计结果存在系统性高估。也有学者尝试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以测度内、外循环水平(赵文举、张曾莲,2022),但目前这种方法在指标选取等方面尚未达成共识,不同研究选取的指标各异,统计结果的可比性较差。价值链分解方法为测度双循环提供了另一重要思路,不少学者基于投入产出模型,从依托国内外市场实现的增加值(黎峰,2021)或对国内外最终需求的依存度(陈全润等,2022)等视角进行测量;但如何结合供求关系有效测度双循环,既有文献尚未提供现成的经验。

关于双循环的就业效应,早期的研究主要运用传统贸易数据在总量层面进行探讨(盛斌、牛蕊,2009;Feenstra等,2010),这种方法忽视了经济循环中经济结构和各流通环节对就业的具体影响(倪红福、田野,2023)。近期的相关研究主要使用价值链分解方法,从内、外需求视角考察不同行业嵌入双循环的就业效应(牛猛等,2023),或定量分解双循环背景下就业变动的影响因素(周薪吉、袁堂军,2024)。然而,这类研究也有不足。首先,内、外需求并不能完全表征双循环的经济含义,基于内、外需求视角衡量的双循环就业效应并不准确。其次,上述研究在国家或行业层面进行了探索,但仍缺乏基于企业视角的经验发现。如何将企业纳入价值链核算,深入考察作为国内大循环主体的内资企业、在外引内联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外资企业及二者的分工合作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促进就业方面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再次,现有多数研究的考察期为2014年之前,未能对2014年后国内外环境变化、逆全球化思潮及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双循环的状况及其就业效应提供必要的知识,不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双循环就业效应的新动态。

综合上述研究进展,本文尝试在以下方面对既有文献进行补充:第一,使用增加值分解方法将供给与需求相结合,构建内外资互促、双循环联动的就业效应分解框架,从国家、行业、企业层面系统考察中国内、外循环的发展特征及其就业带动效应,以期更准确地认识不同行业、企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第二,利用OECD最新公布的全球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库及配套就业数据,从劳动生产率效应、增加值率效应、中间供

给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 4 个方面考察就业变化的影响机制,为深入理解双循环就业效应的动力源提供系统的知识和实证依据。

### 三、数理模型与数据来源

为了考察中国不同行业、企业参与双循环的特征及其对就业的贡献,本文首先构建反映内、外资企业的双循环测算框架,通过引入就业系数将双循环测算框架与就业效应核算框架联系起来,建立内外资互促、双循环联动的就业效应测算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剖析双循环带动就业的影响机制。

表 1 两个国家之间区分内外资企业的投入产出表

投入 / 产出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国家 1		国家 2		国家 1	国家 2	总产出
	D	F	D	F			
中间投入							
国家 1							
D	$Z_{DD}^{11}$	$Z_{DF}^{11}$	$Z_{DD}^{12}$	$Z_{DF}^{12}$	$Y_D^{11}$	$Y_D^{12}$	$X_D^1$
F	$Z_{FD}^{11}$	$Z_{FF}^{11}$	$Z_{FD}^{12}$	$Z_{FF}^{12}$	$Y_F^{11}$	$Y_F^{12}$	$X_F^1$
国家 2							
D	$Z_{DD}^{21}$	$Z_{DF}^{21}$	$Z_{DD}^{22}$	$Z_{DF}^{22}$	$Y_D^{21}$	$Y_D^{22}$	$X_D^2$
F	$Z_{FD}^{21}$	$Z_{FF}^{21}$	$Z_{FD}^{22}$	$Z_{FF}^{22}$	$Y_F^{21}$	$Y_F^{22}$	$X_F^2$
增加值	$Va_D^1$	$Va_F^1$	$Va_D^2$	$Va_F^2$			
总投入	$(X_D^1)'$	$(X_F^1)'$	$(X_D^2)'$	$(X_F^2)'$			

注:表中 D、F 分别代表内、外资企业, X、V、Y 分别代表总产出、增加值、最终需求向量, Z 为中间产品使用矩阵;右上标 1 和 2 分别代表国家 1 和国家 2;对应地,  $Z_{DD}^{12}$  表示国家 2 的内资企业 D 使用国家 1 外资企业 F 生产的中间产品矩阵。

框架,一国的增加值按照生产和消费是否跨境可以划分为 3 类:生产和消费均发生在国内的增加值、生产在国内而消费在国外的增加值,以及涉及跨境生产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增加值。据此,增加值分解框架可表示如下:

$$\hat{V}BY = \hat{V}LY^d + \hat{V}LY^f + \hat{V}LA^fBY \quad (1)$$

其中,  $\hat{V}$  表示增加值系数矩阵  $V$  的对角化矩阵(其中  $V = \frac{Va}{X}$ );  $B$  是经典的 Leontief 逆矩阵;  $L = (I - A^d)^{-1}$ , 表示本国的 Leontief 逆矩阵,其中  $A^d$  表示本国中间投入系数矩阵;  $Y$ 、 $Y^d$  和  $Y^f$  分别表示最终产品、最终产品中被本国使用的部分和最终产品中出口的部分;  $A^f$  为国外中间投入系数矩阵。这一分解框架将要素投入的来源、最终产品需求的去向和经济循环各环节形成直观对应(王欠欠、田野, 2022), 便于测算和理解国际经济活动关系。本文将这一分解框架拓展到双循环测算中,将生产和消费环节全部发生在国内的定义为

#### (一) 双循环测算框架

双循环测算框架是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构建而成,通过考虑内、外资企业在供需各环节的投入产出关系,估计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活动关系。为了便于理解,本文对国家之间经济活动进行简化,仅考虑 2 个国家的情形。假设每个国家有  $N$  个行业,每个行业包括内资(D)和外资(F)两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则国家之间区分内、外资企业的投入产出结构如表 1 所示。

根据 Wang 等(2017)的研究



内循环,生产或消费至少有一个环节发生在国外的界定为外循环;其中生产环节全部在国内而消费环节涉及国外的进一步界定为简单外循环,生产和消费环节均涉及国外的界定为复杂外循环。为了追踪内、外资企业之间循环创造的增加值被其他企业使用的情况,本文借鉴 Wang 等(2021)的方法,将增加值系数的对角化矩阵 $\hat{V}$ 、本国最终产品需求向量 $Y^d$ 、国外最终产品需求向量 $Y^f$ 及国外中间投入系数矩阵 $A^f$ 拆分如下:

$$\hat{V}=\hat{V}_D+\hat{V}_F, Y^d=Y_D^d+Y_F^d, Y^f=Y_D^f+Y_F^f, A^f=A_D^f+A_F^f \quad (2)$$

其中,上标 $d, f$ 分别表示国内、国外,下标 $D, F$ 分别表示内资、外资企业。 $\hat{V}_D$ 和 $\hat{V}_F$ 分别表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增加值对角矩阵; $Y_D^d$ 和 $Y_F^d$ 分别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生产的用于满足本国最终需求的最终产品矩阵; $Y_D^f$ 和 $Y_F^f$ 分别为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生产的用于满足国外最终需求的最终产品出口矩阵; $A_D^f$ 和 $A_F^f$ 分别表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国外中间投入系数矩阵。将式(2)代入式(1),整理可得:

$$\begin{aligned} \hat{V}BY = & \underbrace{\hat{V}_D LY_D^d}_{\text{内—内资企业间内循环}} + \underbrace{\hat{V}_D LY_F^d + \hat{V}_F LY_D^d}_{\text{内—外资企业间内循环}} + \underbrace{\hat{V}_F LY_F^d}_{\text{外—外资企业间内循环}} \\ & + \underbrace{\hat{V}_D LY_D^f}_{\text{内—内资企业间简单外循环}} + \underbrace{\hat{V}_D LY_F^f + \hat{V}_F LY_D^f}_{\text{内—外资企业间简单外循环}} + \underbrace{\hat{V}_F LY_F^f}_{\text{外—外资企业间简单外循环}} \\ & + \underbrace{\hat{V}_D LA_D^f BY}_{\text{内—内资企业间复杂外循环}} + \underbrace{\hat{V}_D LA_F^f BY + \hat{V}_F LA_D^f BY}_{\text{内—外资企业间复杂外循环}} + \underbrace{\hat{V}_F LA_F^f BY}_{\text{外—外资企业间复杂外循环}} \end{aligned} \quad (3)$$

式(3)等号右侧的9项中,前3项的生产和消费均在国内,故属于内循环。其中第1项 $\hat{V}_D LY_D^d$ 表示内资企业创造的增加值被内资企业用于生产国内最终需求,这一部分生产链的上下游只涉及内资企业,故称为“内—内资企业间内循环”;第2项 $\hat{V}_D LY_F^d$ 和 $\hat{V}_F LY_D^d$ 分别表示内(外)资企业创造的增加值用于外(内)资企业生产国内最终需求,这一部分生产链上游的中间品提供者和下游的最终品生产者属于不同的企业类型,即上下游经济活动包含了内、外资企业的分工合作,故称为“内—外资企业间内循环”;第3项 $\hat{V}_F LY_F^d$ 表示外资企业创造的增加值用于外资企业生产国内最终需求,其生产链上下游仅涉及外资企业,故称为“外—外资企业间内循环”。第4~9项的定义方法与此类似,不再赘述。

## (二) 内外资互促、双循环联动的就业效应分解框架

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行业的内、外资企业之间分工合作对就业的贡献,本文在双循环测算框架基础上借鉴张志明等(2016)的方法构建单位增加值的劳动投入系数:

$$e_i = \frac{EM_i}{VA_i} \quad (4)$$

其中, $e_i$ 表示 $i$ 行业创造一单位增加值( $VA_i$ )所需要的就业量( $EM_i$ ),该行业参与内循环和外循环带动的就业( $EM_{in}$ 和 $EM_{ex}$ )分别可以表示为(简化起见,以下省去下标 $i$ ):

$$EM_{in} = \underbrace{e \otimes \hat{V}_D LY_D^d}_{\text{内—内资企业间内循环带动的就业}} + \underbrace{e \otimes \hat{V}_D LY_F^d + e \otimes \hat{V}_F LY_D^d}_{\text{内—外资企业间内循环带动的就业}} + \underbrace{e \otimes \hat{V}_F LY_F^d}_{\text{外—外资企业间内循环带动的就业}} \quad (5)$$

$$EM_{ex} = \underbrace{e \otimes \hat{V}_D LY_D^f}_{\text{内—内资企业间简单外循环带动的就业}} + \underbrace{e \otimes \hat{V}_D LY_F^f + e_F \otimes \hat{V}_F LY_D^f}_{\text{内—外资企业间简单外循环带动的就业}} + \underbrace{e \otimes \hat{V}_F LY_F^f}_{\text{外—外资企业间简单外循环带动的就业}} \\ + \underbrace{e \otimes \hat{V}_D LA_D^f BY}_{\text{内—内资企业间复杂外循环带动的就业}} + \underbrace{e \otimes \hat{V}_D LA_F^f BY + e \otimes \hat{V}_F LA_D^f BY}_{\text{内—外资企业间复杂外循环带动的就业}} + \underbrace{e \otimes \hat{V}_F LA_F^f BY}_{\text{外—外资企业间复杂外循环带动的就业}} \quad (6)$$

上式中，“ $\otimes$ ”表示点乘，即矩阵对应位置的元素相乘。

### (三) 双循环带动就业的影响因素分解

为了考察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因素，本文运用结构分解分析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DA) 方法中的两级分解法 (Dietzenbacher 等, 1998)，对考察期间中国参与双循环对就业变化的影响进行分解。考虑两个时点间的变动 (分别记为 0 期和 1 期，用下标表示)，以内—内资企业间循环带动的就业变化量 (记为  $\Delta EM_D$ ,  $\Delta$  表示变动量) 为例，其就业变化量包含如下 3 个部分：

$$\Delta EM_D = \underbrace{(e_1 \otimes \hat{V}_{D1} L_1 Y_{D1}^d - e_0 \otimes \hat{V}_{D0} L_0 Y_{D0}^d)}_{\text{内—内资企业间内循环带动的就业变化量}} + \underbrace{(e_1 \otimes \hat{V}_{D1} L_1 Y_{D1}^f - e_0 \otimes \hat{V}_{D0} L_0 Y_{D0}^f)}_{\text{内—内资企业间简单外循环带动的就业变化量}} \\ + \underbrace{(e_1 \otimes \hat{V}_{D1} L_1 A_{D1}^f B_1 Y_1 - e_0 \otimes \hat{V}_{D0} L_0 A_{D0}^f B_0 Y_0)}_{\text{内—内资企业间复杂外循环带动的就业变化量}} \quad (7)$$

利用两级分解法对式(7)中的 3 项分别进行分解，第 1 项为内—内资企业间内循环带动的就业变化量，其影响因素分解结果如下：

$$\Delta(e \otimes \hat{V}_D LY_D^d) = \Delta e + \Delta \hat{V}_D + \Delta L + \Delta Y_D^d \quad (8)$$

式(7)中第 2 项 (内—内资企业间简单外循环带动的就业变化量) 的影响因素分解结果为：

$$\Delta(e \otimes \hat{V}_D LY_D^f) = \Delta e + \Delta \hat{V}_D + \Delta L + \Delta Y_D^f \quad (9)$$

类似地，式(7)中内—内资企业间复杂外循环带动就业的影响因素分解结果如下：

$$\Delta(e \otimes \hat{V}_D LA_D^f BY) = \Delta e + \Delta \hat{V}_D + \Delta LA_D^f B + \Delta Y \quad (10)$$

按照同样的思路，可对双循环的其他项带动的就业进行分解，最终得到 4 大类 7 种影响因素，各影响因素及其具体含义如表 2 所示。其中，劳动生产率效应反映劳动生产率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增加值率效应衡量增加值率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中间供给效应由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化与国际生产网络结构变化的效应组成，分别反映国内、国际中间品供给循环对就业带来的影响；最终需求效应反映不同的最终需求对就业的影响，具体包括本国最终需求变化、最终产品出口变化和全球最终需求变化对就业的影响。

(四)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23 年最新公布的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全球区域间投入产出(OECD-AMNE)数据库及配套就业数据库<sup>①</sup>。该数据库涵盖了 2000~2019 年 76 个国家的国别数据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汇总数据,包括 41 个行业的经济活动信息。相较于其他常用的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ADB 等),该数据库能

够清晰呈现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活动,为完整刻画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各经济系统之间的产业关联与贸易联系提供了数据基础(王振国等,2022)。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分析过程中将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视为一个复合经济体(即“国外”)。

表 2 双循环带动就业的影响因素

效应名称	释 义
劳动生产率效应	
劳动生产率变化( $\Delta e$ )	劳动投入系数变化对就业的影响
增加值率效应	
增加值率变化( $\Delta V$ )	增加值系数变化对就业的影响
中间供给效应	
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化( $\Delta L$ )	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
国际生产网络结构变化( $\Delta LA^FB$ )	国际生产网络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
最终需求效应	
内需	
本国最终需求变化( $\Delta Y^d$ )	本国最终需求变化对就业的影响
外需	
最终产品出口变化( $\Delta Y^f$ )	最终产品出口变化对就业的影响
全球最终需求变化( $\Delta Y$ )	全球最终需求变化对就业的影响

四、测算结果与分析

基于前文介绍的数据与方法,本文从国家、行业和企业 3 个层面实证分析 2000~2019 年中国双循环的发展特征及其就业效应,以期理解“内外资互促、双循环联动”的就业效应提供新的视角和经验知识。

(一) 国家层面

1. 双循环的发展状况

基于上文介绍的双循环测算框架,本文估计了 2000~2019 年中国双循环发展水平及其具体构成,结果如图 1 所示。由图 1 中的曲线可知,2000~2019 年期间,中国内循环占比在 75.5%~85.9%之间,均值接近 81.3%,在双循环中占据主体地位<sup>②</sup>。从发展趋势看,内循环占比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复杂外循环的水平逐步超过简单外循

① 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全球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来源: <https://www.oecd.org/en/data/datasets/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nd-global-value-chains.html>, 目前该数据库更新到 2019 年(最后访问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16 日)。  
② 图 1 中的“内循环”“简单外循环”“复杂外循环”分别指中国参与内循环、简单外循环、复杂外循环创造的增加值总量;“内循环占比”指中国参与内循环创造的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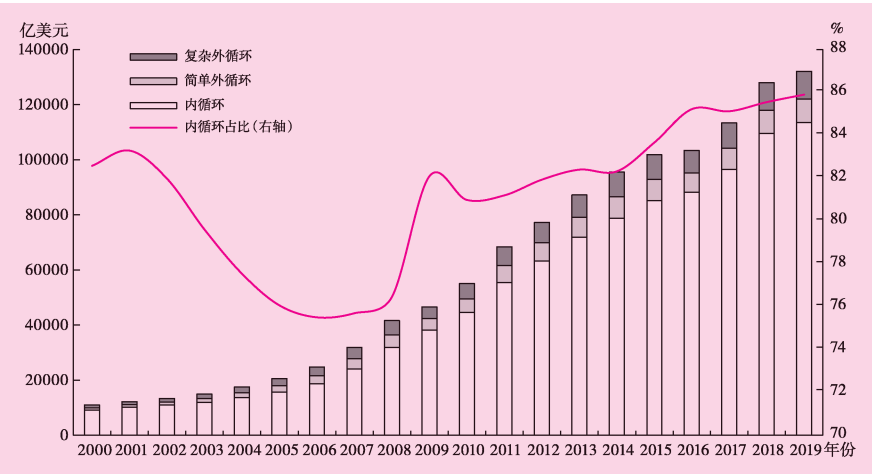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19年中国双循环发展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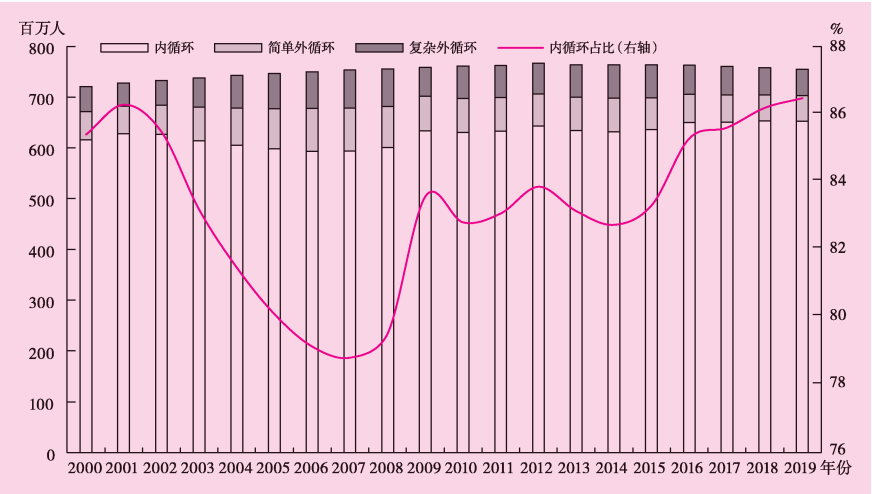


图2 2000~2019年中国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

环,意味着中国生产复杂度提高,产业链向上游延伸(倪红福、王海成,2022)。

2. 双循环的就业带动效应

图2给出了双循环带动的就业规模估计结果。从总体看,考察期间内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平均占比接近83.3%,占主导地位。从发展趋势看,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从2000年的720.8百万人增长到2019年的754.5百万人。其中,内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呈

“U”型变动特征,复杂外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在2014年之后超过简单外循环。由于复杂外循环以出口中间品为主,简单外循环以出口最终品为主,二者的相对变化趋势意味着,外循环带动就业的渠道由最初主要依靠出口最终产品逐步转变为出口中间品为主的外循环。究其原因,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间产品的出口增多;中间品的生产和出口通过延伸价值链的分工长度,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从相应就业规模的增长速度来看,考察期间,内循环带动的就业年均增长率为1.2%,远低于同期内循环经济年均增长率(6.6%)。这说明,考察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未能带来就业的同步增加,这可能与考察期内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资本驱动向资本与技术创新共同驱动转变有关(蔡昉等,2004),后者具有劳动节约型特征。



(二) 行业层面

1. 中国六大类行业参与双循环的状况

图 3 给出了 2000~2019 年中国 6 类行业参与内循环的情况。整体来看,就内循环参与水平而言,建筑业最高,总体保持在 99.0%以上,其次是农业、服务业;外循环参与水平中,制造业最高<sup>①</sup>。从双循环参与水平的变化趋势看,除建筑业外,其余 5 个行业参与内循环的水平与全国层面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在考察期间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趋势。

2. 六大类行业参与双循环的就业带动效应

图 4 给出了不同行业参与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总体来看,服务业参与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最多,其次是农业、制造业、建筑业、矿业和水电气业。从动态趋势看,服务业与农业参与双循环的就业带动效应呈“一增一减”的变化态势;在考察期间,农业参与

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呈下降趋势,但其总量仍相当可观,在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波动时为农村流动劳动力提供了缓冲就业机会。制造业参与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总体比较稳定,有望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发挥“保就业”的稳定器作用。与其他行业相比,服务业是带动就业的牵引器。为此,下文将重点分析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循环发展水平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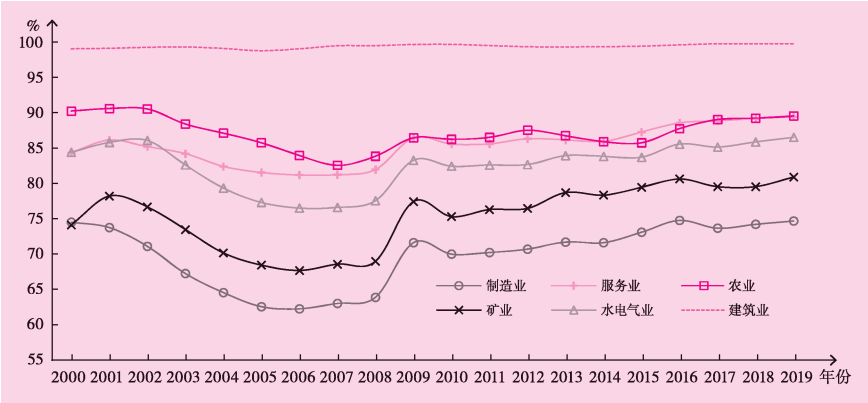


图 3 2000~2019 年中国各行业参与内循环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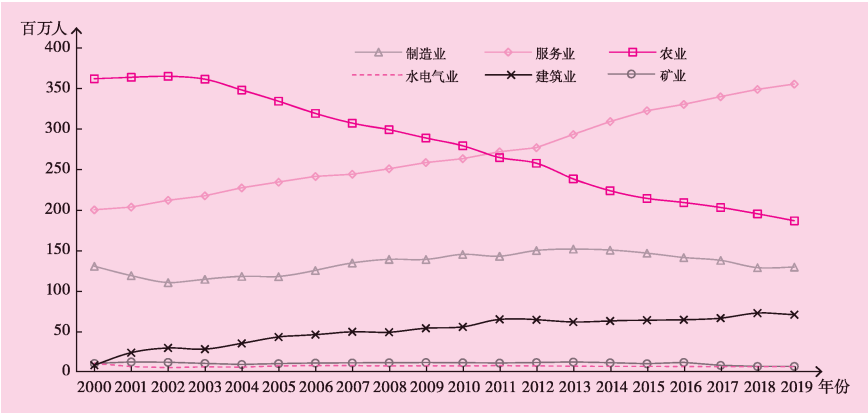


图 4 2000~2019 年中国各行业参与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

① 由于内循环水平与外循环水平之和等于 1,所以外循环变化趋势与内循环相反。

其就业带动效应。

(1)制造业细分行业分析

借鉴杨仁发和郑媛媛(2023)的做法,本文将制造业按照要素密集度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3类,考察不同类型制造业参与双循环的就业带动效应。由表3可知,总体来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参与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最多,其次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于所有类型的制造业,内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均明显更多。

表3 制造业参与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 单位:百万人

年份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小计	内循环	简单外	复杂外	小计	内循环	简单外	复杂外	小计	内循环	简单外	复杂外
2000	36.6	21.8	9.5	5.3	45.6	36.0	3.5	6.2	48.1	35.8	5.5	6.8
2005	42.6	19.1	15.5	7.7	36.8	24.1	4.3	8.0	38.9	22.9	7.2	8.8
2010	48.6	28.8	12.6	7.2	40.4	29.9	3.6	7.0	56.0	36.7	9.2	10.1
2015	46.1	30.1	10.0	6.0	40.1	31.0	3.0	6.2	60.3	41.2	9.0	10.0
2019	39.0	26.9	7.5	4.7	34.2	26.9	2.4	4.9	56.0	38.4	8.6	9.1

注:“简单外”与“复杂外”分别指“简单外循环”与“复杂外循环”;受小数位保留过程中四舍五入的影响,各类制造业中内循环、简单外循环、复杂外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之和可能与总就业带动数量有微小出入,下表同。

从发展趋势来看,考察期间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参与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呈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48.1百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56.0百万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带动的就业数量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从2000年的36.6百万人上升到2010年的48.6百万人,此后转为下降,到2019年相应规模约39.0百万人。考察期内,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参与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呈波动下降趋势。

综合而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参与双循环已成为近年来中国就业增长的主动力;相比之下,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参与双循环带动就业的能力有下降趋势。此外,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参与复杂外循环的就业带动效应大于简单外循环。

(2)服务业细分行业分析

借鉴韩峰和阳立高(2020)的做法,本文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表4的结果显示,首先,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从2000年的86.4百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213.1百万人,年均增长率为5.3%;生活性服务业参与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从2000年的113.7百万人增长到2019年的142.5百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6%。可见,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双循环对就业产生了更强的带动作用,是服务业的就业带动效应逐年增大的主要贡献者。其次,对任一类型的服务业而言,内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均大于外循环。再次,从不同类型的外循环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复杂外循

环的就业带动效应大于简单外循环，而生活性服务业参与简单内循环的就业带动效应大于复杂外循环。综上，服务业是现阶段双循环带动就业数量最多的行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表现尤为突出。

表 4 服务业参与双循环带动就业数量 单位：百万人

年份	服务业			生活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			
	内循环	简单外	复杂外	小计	内循环	简单外	复杂外	小计	内循环	简单外	复杂外
2000	151.5	18.5	30.1	113.7	104.2	6.9	2.7	86.4	66.6	9.0	10.8
2005	174.6	20.1	39.6	110.4	101.4	5.5	3.5	124.0	88.2	17.5	18.3
2010	202.3	23.8	37.2	118.3	111.8	3.8	2.7	145.0	112.3	15.4	17.3
2015	250.2	27.7	44.7	114.7	107.1	4.0	3.6	208.0	165.8	19.6	22.5
2019	285.6	26.3	43.8	142.5	136.9	3.0	2.5	213.1	175.1	17.9	20.1

### （三）企业层面

#### 1. 不同类型企业参与双循环的状况

表 5 以企业参与双循环创造的增加值大小为衡量标准，展示了不同类型（内、外资）企业之间分工合作的情况。整体来看，首先，内—内资企业间循环创造的增加值最大。考察期间，内—内资企业间循环的增加值占比均值为 78.5%，随时间呈上升趋势。其次，对所有类型的企业间循环而言，内循环占比均大于外循环。再次，内—内资企业间循环是中国内循环的主体，外—外资企业间循环是外循环的主体。

表 5 不同类型企业参与双循环创造的增加值占比 单位：%

年份	内—内资企业间循环			内—外资企业间循环			外—外资企业间循环		
	增加值	其中：		增加值	其中：		增加值	其中：	
		内循环	外循环		内循环	外循环		内循环	外循环
2000	74.5	87.8	12.2	16.4	71.5	28.5	9.1	59.4	40.6
2005	73.7	82.0	18.0	16.9	62.0	38.0	9.4	54.8	45.2
2010	75.1	86.3	13.7	16.0	66.5	33.5	8.8	61.8	38.2
2015	81.8	87.7	12.3	12.8	67.0	33.0	5.3	61.3	38.7
2019	83.9	89.1	10.9	11.2	69.9	30.1	4.9	66.9	33.1

#### 2. 不同类型企业参与双循环的就业带动效应

表 6 给出了不同类型企业间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总体来看，内—内资企业间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最多，内—外资企业间循环次之；对于所有类型的企业间循环，内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均大于外循环。

从动态趋势看，首先，内—内资企业间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内—外资企业间循环、外—外资企业间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有不同幅度的下降，但考察期间后两者对中国就业的贡献仍在 15%~20%之间，其作用不容忽视。其次，2009 年内—内资

表 6 不同类型企业参与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 单位:百万人

年份	内—内资企业间循环			内—外资企业间循环			外—外资企业间循环		
	总就业	内循环	外循环	总就业	内循环	外循环	总就业	内循环	外循环
2000	576.5	518.9	57.6	102.9	72.4	30.5	41.5	24.3	17.2
2005	602.2	512.1	90.1	105.6	66.1	39.5	38.7	19.7	19.1
2010	606.6	530.5	76.1	112.0	75.4	36.6	42.4	24.3	18.1
2015	635.2	553.1	82.1	95.9	63.8	32.1	32.2	18.9	13.2
2019	643.2	575.3	67.9	79.5	55.8	23.6	31.9	21.3	10.6

企业间循环与内—外资企业间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分别较 2008 年增加了 1.59 百万人与 2.38 百万人<sup>①</sup>,而外—外资企业间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则减少了 1.33 百万人;这些变动反映了在经受外部冲击时以内资企业为依托的循环更加有利于就业的稳定增长。

五、双循环就业带动效应变化的影响机制

为了探讨双循环带动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机制,本文运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分解了劳动生产率效应、增加值率效应、中间供给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对就业变化的贡献。

表 7 全国层面双循环带动就业的影响因素分解结果 单位:百万人

效应名称	2000~2019 年	2007~2009 年	2014~2017 年
总效应	33.6	5.1	-2.9
劳动生产率效应 $\Delta e$	-3391.0	-280.1	-110.2
增加值率效应 $\Delta V$	-413.7	52.7	32.9
中间供给效应	698.1	-3.9	-43.5
$\Delta L$	484.8	-5.7	-40.6
$\Delta L A^F B$	213.3	1.8	-2.9
最终需求效应	3140.2	236.4	117.9
$\Delta Y^d$	2909.2	233.7	120.8
$\Delta Y^f$	186.4	3.7	-2.9
$\Delta Y$	44.6	-1.0	-0.0

注:2000~2007 年、2007~2009 年、2009~2014 年、2014~2017 年、2017~2019 年五个时间段内的总效应加总等于 2000~2019 年的总效应,后表同;2000~2019 年总效应为 33.6 百万人表示的是 2019 年的就业数量比 2000 年的就业数量增加了 33.6 百万人,这一结果与根据中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结果完全一致(2000 年为 720.9 百万人,2019 年为 754.5 百万人)。

(一) 国家层面

表 7 展示了全国层面的影响因素分解结果。2000~2019 年,中间供给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带来的潜在全国就业规模增长分别为 698.1 百万人和 3 140.2 百万人,劳动生产率效应和增加值率效应带来的潜在就业增长分别为 -3 391.0 百万人和 -413.7 百万人;综合这些效应,2000~2019 年双循环带来的全国就业规模净增加 33.6 百万人。

上述效应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就业贡献不同。结合上文图 1 中内循环占比变动态势判断,2007、2009、2014 和 2017 年中国双循环

① 受篇幅所限,表中未逐年展示完整的结果。

水平变化较为明显,为方便起见,本文以这 4 个时间节点为参考将考察期间划分为 5 个时间段,分别考察各时间段双循环带动就业变动中不同效应的贡献<sup>①</sup>。表 7 显示,在各个细分时间段,劳动生产率效应带来的就业规模增量均为负,反映了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创造性破坏。从其他效应来看,2007~2009 年与 2014~2017 年增加值率效应为正,中间供给效应则为负,反映了这两个时间段受外部需求冲击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单位产出的中间供给比例下降,增加值率上升(刘瑞翔等,2017)。最终需求效应的贡献分解结果显示,在金融危机发生前(2000~2007 年)内需是外需的 4.4 倍,金融危机期间(2007~2009 年)这一数值高达  $86.5(=\frac{233.7}{3.7-1.0})$  倍。由此可见,内需是稳定就业的主要因素,在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尤为如此。因而,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巩固内需对就业增长的基本盘作用。

(二) 行业层面

1. 制造业细分行业分析

表 8 展示了制造业参与双循环的就业带动效应分解结果。从考察期间整体看,增加值率变化对就业的影响为正,中间供给效应中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为负。这与前文不分行业(国家层面)的研究发现相反。分时期的结果显示,制造业的增加值率效应在 2007~2009 年和 2014~2019 年期间对就业的影响为正。中间供给效应中,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在 2009 年之后由正转负,国际生产网络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在 2017 年之后由正转负(表中未展示)。究其原因,前者表明中国制造业生产环节减少了对国内中间产品的使用,印证了前文得出的制造业参与外循环水平更高的结论;后者则可能与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施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制造业回流有关。

从制造业的行业异质性来看,首先,增加值率效应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为正,但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效应为负。这可能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单位产出所

表 8 制造业参与双循环带动就业的影响因素分解 单位:百万人

效应名称	年 份			劳动	资本	技术
	2000~2019	2007~2009	2014~2017	密集型	密集型	密集型
总效应	-1.0	4.4	-12.7	2.5	-11.4	7.9
劳动生产率效应 $\Delta e$	-675.4	-44.3	-25.4	-180.4	-264.4	-230.6
增加值率效应 $\Delta V$	17.5	6.3	5.7	-4.6	15.1	6.9
中间供给效应	33.9	3.2	-5.4	48.5	3.1	-17.7
$\Delta L$	-43.2	2.1	-5.9	31.3	-28.0	-46.6
$\Delta LA^FB$	77.1	1.1	0.5	17.2	31.0	28.9
最终需求效应	623.0	39.2	12.4	139.0	234.8	249.3
$\Delta Y^d$	529.3	38.1	13.4	107.3	211.7	210.3
$\Delta Y^f$	77.7	1.6	-1.0	27.4	18.0	32.4
$\Delta Y$	16.0	-0.5	-0.0	4.3	5.2	6.6

① 受篇幅所限,仅展示部分时间段,后同。



需的中间产品投入比例增加,导致其增加值率下降有关(刘瑞翔等,2017)。其次,相较于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就业的负向影响更大。这可能与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会降低就业总量有关。最后,相较于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最终产品出口变化和全球最终需求变化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就业的贡献最大,这可能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技术复杂、分工环节多、国际参与度较高有关。

2. 服务业细分行业分析

表9展示了服务业参与双循环带动就业效应的分解结果。从整个考察期来看,服务业增加值率变化对就业的影响为正,这与国家层面发现不同。分时段来看,服务业增加值效率在2007~2009年与2014~2017年对就业的影响均为正。

表9 服务业参与双循环带动就业的影响因素分解 单位:百万人

效应名称	年 份			生活性	生产性
	2000~2019	2007~2009	2014~2017	服务业	服务业
总效应	155.7	14.4	30.8	28.9	126.7
劳动生产率效应 $\Delta e$	-1441.0	-92.5	-47.3	-847.6	-593.4
增加值率效应 $\Delta V$	84.9	26.7	30.6	54.0	30.8
中间供给效应	199.1	-1.7	-11.4	23.7	175.4
$\Delta L$	135.3	-1.6	-10.2	12.9	122.4
$\Delta LA^{FB}$	63.8	-0.1	-1.2	10.8	53.0
最终需求效应	1312.7	81.9	58.9	798.8	513.9
$\Delta Y^d$	1246.5	81.5	60.2	784.0	462.5
$\Delta Y^f$	51.5	0.8	-1.3	12.5	39.0
$\Delta Y$	14.7	-0.4	0.0	2.3	12.4

从行业异质性来看,首先,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对生活性服务业的负向影响大于生产性服务业。其次,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带动效应远大于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影响,而

本国最终需求变化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正向影响却小于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影响。再次,无论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化与本国最终需求变化(内循环影响因素)的就业带动效应都大于国际生产网络结构变化与国外最终需求变化(外循环影响因素)。

(三) 企业层面

表10展示了不同类型企业间循环带动就业的因素分解结果。从考察时期整体来看,企业层面的分解结果与国家层面结果一致。从各时期的变化来看,首先,在2007~2009年与2014~2017年增加值率效应对就业的影响均为正,而中间供给效应对就业的总体影响为负。这可能是因为,中间产品供给占比与增加值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夏明、张红霞,2015)。其次,最终产品需求效应中,外需变化在2007~2009年与2014~2017年对不同类型企业间循环的就业效应总体为负,这可能与中国在这两个时间段分别

经历外部需求冲击和国内经济结构转型有关。

从不同类型企业间循环的就业效应来看,首先,相较于内—外资企业间循环与外—外资企业间循环,劳动生产率变化对内—内资企业间循环带动就业的负向影响

更大。其次,就内—内资企业间循环来说,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带动作用远大于国际生产网络结构变化,但外—外资企业间循环的情况与之相反;这可能与同类资产的企业间形成价值链生产关系的成本和风险较小有关。再次,对所有类型的企业间循环,内需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始终远大于外需。

表 10 不同资本类型企业间循环带动就业的影响因素分解 单位:百万人

效应名称	劳动生产率	增加值	中间供给效应		最终需求效应		
	效应 $\Delta e$	率效应 $\Delta V$	$\Delta L$	$\Delta LA^*B$	$\Delta Y^d$	$\Delta Y^f$	$\Delta Y$
2000~2019 年							
内—内资	-2866.2	-349.2	493.6	150.1	2491.6	119.7	27.1
内—外资	-388.5	-55.1	0.2	48.3	315.5	44.7	11.4
外—外资	-136.3	-9.5	-9.0	14.9	102.1	22.0	6.2
2007~2009 年							
内—内资	-226.2	44.1	-6.1	1.9	193.3	3.8	-0.5
内—外资	-40.9	5.8	0.3	0.3	31.2	-0.1	-0.4
外—外资	-13.0	2.8	0.2	-0.4	9.3	-0.1	-0.2
2014~2017 年							
内—内资	-95.2	30.1	-34.7	-1.2	110.1	-1.1	-0.1
内—外资	-12.2	2.6	-5.6	-1.4	7.5	-1.2	0.0
外—外资	-2.9	0.2	-0.2	-0.4	3.2	-0.6	0.0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 OECD 最新公布的全球区域间企业投入产出数据库及配套的就业数据库信息,基于内外资互促、双循环联动的就业效应分解框架,从国家、行业及企业层面考察了双循环的发展态势及其对就业的贡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经济体中内循环水平始终高于外循环,内循环带动的就业规模占主导地位。在外循环参与中,考察期间复杂外循环的参与水平及其就业效应均超过简单外循环,但相应特征存在行业及企业异质性。第二,服务业参与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最多,且随时间呈上升趋势,生产性服务业是就业带动效应的最大贡献者;农业参与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仅次于服务业,但整体呈下降趋势;制造业参与双循环的就业带动效应表现出以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基石、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增长点的新特征。第三,内—内资企业间循环创造的增加值及带动的就业最多,且随时间呈上升趋势;内—外资企业间循环与外—外资企业间循环带动的就业虽有所下降,但二者的贡献依然不容小觑。第四,因素分解结果表明,总体上中间供给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对就业的正向影响更大,完全抵消了劳动生产率效应和增加值率效应对就业的负向影响,使得考察期间各因素的总就业效应为正。中间供给效应与最终需求效应中,内循环因素(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化与内需变化)对就业的影

响更大;不同行业、企业的增加值率效应、中间供给效应与最终需求效应对就业的贡献随时间变化。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就业促进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是继续坚持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更好地利用双循环联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一方面,稳固内循环带动就业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以内循环为立足点是应对外循环不确定性的根本;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复杂外循环,拓宽中国经济活动价值链的深度和广度,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是鼓励企业优势互补,推动企业间分工合作,更好地利用内外资互促实现就业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尽管内—外资企业间循环与外—外资企业间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二者依然对就业有重要贡献。因此,一方面,要打通企业间分工协作的堵点、瘀点,促进资源要素顺畅流动;另一方面要稳定外商投资的预期和信心,引导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分工合作,充分协调内、外资企业的资源优势,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

三是充分发挥制造业作为就业稳定器、服务业作为就业牵引器的综合作用,巩固农业对就业的缓冲器作用。第一,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带动就业的能力较强,政府和企业要继续加大对核心技术研发投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夯实制造业作为就业稳定器的重要地位。第二,服务业是现阶段双循环带动就业数量最多的行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应充分利用数字赋能提高服务业水平,积极利用国内、外优质服务资源,更好地发挥服务业作为就业牵引器的带动作用。第三,农业参与双循环带动的就业数量虽然下降,但体量较大,在经济剧烈波动或外部形势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为农村流动劳动力提供就业缓冲。

四是优化供给结构,扩大消费需求,实现供需良性互动,促进就业稳步增长。中间供给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对就业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内需是带动就业增长的强力引擎。因此,一方面应完善体制机制,打通阻碍内、外循环的堵点、瘀点,进一步扩大内需和外需;另一方面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提升供应链韧性的同时增强产业链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实现供需良性互动,促进就业稳步增长。

五是加强人力资本培育,提升劳动力技能,缓解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冲击。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对就业规模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为此,在共享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要积极应对技术进步对就业带来的挑战。政府要从政策上支持建立多元化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帮助劳动者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环境,提高劳动者与岗位的适配度,有效推动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同步发展。

#### 参考文献:

1. 包群等(2015):《外资竞争、产业关联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存活》,《经济研究》,第7期。

2. 蔡昉等(2004):《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经济研究》,第9期。
3. 陈全润等(2022):《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方法及我国双循环格局演变趋势分析》,《中国管理科学》第1期。
4. 葛阳琴、谢建国(2019):《需求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季刊)》,第4期。
5. 韩峰、阳立高(2020):《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一个集聚经济与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的综合框架》,《管理世界》,第2期。
6. 韩国高等(2021):《外资进入有助于本土企业“稳就业”吗——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国际贸易问题》,第5期。
7. 江剑平等(2024):《科技创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第1期。
8. 江小涓(2010):《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内需和外需》,《管理世界》,第6期。
9. 江小涓、孟丽君(2021):《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第1期。
10. 黎峰(2021):《国内国际双循环:理论框架与中国实践》,《财经研究》,第4期。
11. 刘瑞翔等(2017):《全球空间关联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5期。
12. 倪红福、田野(2023):《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动态变迁与国际比较——引入要素权属异质性的全球价值链分解新框架》,《经济学(季刊)》,第5期。
13. 倪红福、王海成(2022):《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结构变化》,《经济研究》,第2期。
14. 牛猛等(2023):《中国双循环就业效应及驱动因素研究——纳入功能分工的新视角》,《国际贸易问题》,第3期。
15. 盛斌、牛蕊(2009):《国际贸易、贸易自由化与劳动力就业:对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研究》,《当代财经》,第12期。
16. 汤铎铎等(2020):《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第8期。
17. 王欠欠、田野(2022):《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测度及增长结构分解》,《经济学动态》,第11期。
18. 王振国等(2022):《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地域结构变迁及变化动因》,《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期。
19. 夏明、张红霞(2015):《跨国生产、贸易增加值与增加值率的变化——基于投入产出框架对增加值率的理论解析》,《管理世界》,第2期。
20. 谢伏瞻等(2020):《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上)》,《经济研究》,第12期。
21. 徐奇渊(2020):《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和构建》,《金融论坛》,第9期。
22. 杨仁发、郑媛媛(2023):《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及韧性影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8期。
23. 曾艺等(2023):《减税激励、供应链溢出与稳就业》,《管理世界》,第7期。
24. 张俊荣等(2022):《基于企业规模异质性的中国内外循环就业效应及影响因素探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第12期。
25. 张志明等(2016):《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5期。
26. 赵文举、张曾莲(2022):《中国经济双循环耦合协调度分布动态、空间差异及收敛性研究》,《数量经济

技术经济研究》,第2期。

27. 周薪吉、袁堂军(2024):《双循环视角下的中国就业变动影响因素研究》,《当代财经》,第5期。

28. Antràs P. (2020), Conceptual Aspect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34(3): 551–574.

29. Dietzenbacher E., Los B. (1998),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Techniques: Sense and Sensitivity.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10(4): 307–324.

30. Feenstra R.C., Hong C. (2007), China's Exports and Employ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13552. DOI: 10.3386/W13552.

31. Wang Z., Wei S.J., Yu X., et al. (2017), Meas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 NBER Working Paper. DOI: 10.3386/W23222.

32. Wang Z., Wei S.J., Yu X., et al. (2021), Tracing Value Added in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BER Working Paper. DOI: 10.3386/W29335.

33. Yue Y., Hou J., Zhang M., et al. (2024), Does the Sticky Relationship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Help Stabilize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69(2): 632–651.

### The Employment Effect of Domestic–Foreign Capital Interaction in Dual Circulation and Its Decomposition

Zhu Jinsheng   Qu Doudou   Wang Zhenguo

**Abstract:** This article utilizes the OECD's Global Regional Input–Output data and its complementary employment data from 2000 to 2019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China's dual circulation strategy on employment at national, industrial, and enterprise levels. Using a framework that decomposes employment effec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dynamics, the study finds that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China's internal circulation and its employment effects take the lead at all levels. Across various types of external circulation, participation in complex external circulation has a greater contribution on employment as compared with simple external circulation, albeit its heterogeneity across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Specifically, the service sector's dual circulation has an increasing employment impact, as a major employment engine. While 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s dual circulation declines over time, it remains second and serves as an important employment stabilizer.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ranking the third in employment impact from dual circulation, exhibits no significant change and acts as a stable employment provider. At enterprise level, domestic–domestic enterprises' internal circulation contributes most and increasingly to the added values and employment. Meanwhile, domestic–foreign and foreign–foreign enterprises' circulations have slightly declining employment impacts, yet their contributions remain substantial. The results of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DA) indicate that the positive employment effects of intermediate supply and final demand offset the negative ones from labor productivity and added value rate, ensuring a stable employment growth. 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 exhibits heterogeneity across industries and over time.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policy propositions on promoting high–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Keywords:** Dual Circulation; Domestic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Employment; Input–Output Analysis;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责任编辑:牛建林)